

· 中国文体学研究 ·

## 论宋代奏事制度中的奏劄写作

邬志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7)

**摘 要:** 劄子是宋代产生、兴盛并广泛使用的新文体,涉及三种文体类型:奏议、公移、书信。作为奏议文体的奏劄最初是面奏的辅助工具,宋初范质等宰臣在面奏皇帝时为避免疏失而使用。上殿奏事用劄子,在太祖朝出现,到真宗年间开始变成独立的奏议文书,其进呈方式、覆奏方式通过诏令一步步规范而形成定制。劄子最开始为两府、大两省等近臣高官使用,后来因为劄子上奏途径便捷,能直接在御前进呈,文体体式简洁,批复方式简单,使用官员级别高,更受皇帝重视,故宋代官员使用劄子奏事越来越多。由于奏劄常在御前展读,奏劄的写作讲究叙事、义理、文辞、文气等修辞技巧,大量宋人奏劄因其议题的经典性、写作风格的可借鉴性而成为经典奏议文,为奏劄这一新文体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典作品。

**关键词:** 宋代; 奏劄; 文体; 上殿奏事; 轮对

劄子是宋代产生并兴盛的重要文体,在宋人的总集与别集中,劄子非常多见。劄子在宋代涉及三种文体类型,即奏议、公移、书信。劄子在北宋时期作为奏议、公移文体而存在,到南宋年间则增加了书信的功能,这种变化在南北宋之交发生,到南宋绍兴年间,书信劄子即已广泛使用。这与劄子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身份不断下移有关,也就是说,劄子在宋代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公牍文向私人书信迁移的过程。这个迁移过程,从文体发展来看,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暂不详细展开。

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奏劄由产生到兴盛的发展演变过程,以期较全面清晰地展现宋代奏议文体新变的原因。唐人奏事主要用表、状,而宋人在表、状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体——劄子。作为上行文的奏事劄子,简称奏劄,是宋代重要的奏议文体,宋人多称为上殿劄子、轮对劄子、转对劄子等。这些劄子,名号虽异,但功能都是上殿奏事用。研究奏劄的形成过程、文体体式、使用场合、进呈方式、覆奏方式等,不但可以发现奏议类文体至宋代发生的文体新变,而且能从这种变化中得窥宋代的政治制度与政治风气的发展变化,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奏劄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sup>①</sup>,但还比较薄弱,属于关注较少的文体。本文从宋代的奏事制度出发,探讨奏劄这一新文体的形成过程,在考察宋代奏劄的文体特点、使用场合的同时,关注其进呈方式与使用者的身份问题,在历史场景与制度运作过程中展现奏劄的文体特征、政治功能以及宋代奏议类新文体的确立过程。

<sup>①</sup> 关于奏劄的研究,周佳的《北宋上殿札子探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对上殿札子的呈递、覆奏、署名等问题做了较细致的探讨。此外,梅华的《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以表、状、札子为例》(《南昌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李平的《宋代公文“札子”研究》(《兰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毛天宇的《宋代劄子公文:内容与运作》(《兰台世界》2013年第23期)等论文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一、宋代劄子的文体类别

宋代劄子使用范围广,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使用对象、使用场合在不断变化,劄子的文体功能也在不断扩大,使得劄子成为一种面目较为模糊的文体。历史资料中对宋代劄子的称呼各异,除劄子这一统称之外,还有奏劄、上殿劄子(殿劄)、堂劄、中书劄子、尚书省劄子(省劄)、枢密院劄子、帅劄、四六劄子、叠幅劄子等众多称呼。从历史资料和文集收录的情况看,这些名称各异的劄子在宋代涉及三种文体类型:奏议、公移、书信。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分别在“奏疏”与“公移”两条中提及劄子,较为简要清晰:

魏晋以下,启独盛行。唐用表状,亦称书疏。宋人则监前制而损益之,故有劄子,有状,有书,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盖本唐人牒子、录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sup>①</sup>

宋制:宰执带三省枢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执带三省枢密院事出使者,及从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状;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者列之。<sup>②</sup>

从徐师曾的叙述可以看到,宋代劄子有奏疏、公移两种文体类型,作为奏疏的“劄子”是由唐人牒子、录子变化而来的一代之新式<sup>③</sup>,同表、状一样是上奏文字;而作为公移类文书的“劄”,是作为宰执的三省或枢密院长官,用来发给六部处理事务的公文。

从宋代别集收录劄子的分类来看,劄子也往往归入奏疏、章奏、奏议等文体类别,劄子在宋代主要作为奏议文体而存在。宋人集中大量出现的上殿劄子、轮对劄子、转对劄子等,名号虽异,但功能都是上殿奏事用,属于上行公文,可以统称奏劄。据笔者统计,约有60多部宋人别集中有劄子收录,从数量来看,劄子存录较多者如司马光、欧阳修、范祖禹、周必大、杜范、陈著等人都有10卷以上,而其他大部分文集都有1卷以上劄子收录。从总集来看,如王霆震《古文集成》、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总集均设有“劄”“奏劄”“劄子”等类目。吕祖谦《宋文鉴》虽然没有列出“劄子”的文体类目,但其卷41-62“奏疏”类目中收录了大量宋人奏议劄子。

而堂劄、中书劄子、尚书省劄子(省劄)、枢密院劄子、帅劄等则是宋代中枢机构处理公务的下行文书。作为下行文的省劄,是中书劄子、尚书省劄子的简称。宋代元丰改制前,政令由中书门下出,称中书劄子,改制后政令由尚书省出,称尚书省劄子,简称省劄。省劄本是宋代中书门下或尚书省处理政务的一种政务文书。从北宋到南宋,省劄的使用日渐增多,劄子从中书执政官指挥公务的文书慢慢变成一种常见的中枢机构下行公务文书,于是,尚书省有“省劄”,枢密院有“密院劄子”,诸路帅司有“帅劄”。与奏劄被大量收入文人集不同,省劄在文人集中罕见收录。

除以上两种文体的劄子外,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书信劄子。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文体刍言》除在“奏议类”列劄子外,在“书牒类”也有列有劄子一体,“古有笔劄之称,即书劄之劄,非

①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奏疏》,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4页。

②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公移》,第127页。

③ 作为奏疏的“劄子”与“牒子”并非同一文体,这是一个复杂的考证问题,笔者将另撰文详述。

奏劄之劄也。然历观古人集中,奏劄之传尚多,而书劄之传盖少矣。”<sup>①</sup>文集中保存的书信劄子确实不如奏劄多,但也不少。总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54设有“劄子、叠幅劄子”类目,所收录的作品即为书信类型的劄子,并不用于奏事。南宋时的众多文人别集也收录有专门的书信劄子,如晁公遡《嵩山集》卷34-44十卷收录的全是书信劄子。周必大《文忠集》除卷134-145收录了奏劄之外,在卷189-199收录了十卷书信劄子。此外,还有陈著《本堂集》、刘宰《漫塘文集》、陈造《江湖长翁集》、姚勉《雪坡舍人集》、林希逸《庸斋续集》等12家宋人别集均收录有书信劄子。

何谓劄?从文字来看,劄与札为繁简体之不同,但历史文献中劄、札二字均有使用,且二字并不混用,因此,本文并不将劄简写为札,以示区别。在历史文献中,“札”的出现与使用较“劄”更早。班固《汉书》中有几处提及“札”,如《郊祀志第五上》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冕侯,问于鬼臾区’”<sup>②</sup>的记载,颜师古注对“札”的解释为:“札,木简之薄小者也。”<sup>③</sup>汉代,纸未多用,札作为单片的木简,是书写的载体。刘熙的《释名》中对“札”的解释为“札,栝也,编之如栝齿相比也。”毕沅引《说文解字》疏证说:“‘册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故曰‘编之如栝齿相比’。”<sup>④</sup>可见,用来书写的札一片片编次如栝齿。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sup>⑤</sup>札为单片的木简的意义较为明显。

在宋前的历史文献中较少见到“劄”字,《文心雕龙》中“札”、“劄”同见,《章句》篇、《书记》篇中有“劄”字,其意义并没有太多区别。

而“劄”字到宋代开始多见,宋人札与劄并用,二者有一定区分。作为文体的“劄子”在宋代并没有写作“札子”的情况。作为宋代新文体类型,有“御札”与“御劄”之分,二者并不是同一文体。御札为敕书之变,是天子发布号令所用文书。《宋史·职官志》“中书省”条记载:“凡命令之体有七:……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号令,则用之。”<sup>⑥</sup>《宋文鉴》卷33即设有御札一体,收欧阳修、王珪、元绛等所撰御札3篇。而“御劄”为“御前劄子”的简称,是以皇帝的名义写给臣僚的下行文书,与命令之体无关。

徐师曾说:“劄者,刺也。”<sup>⑦</sup>刺是古人投谒所用的名帖,刘熙在《释名》释书契条提及汉代有“爵里刺”,“‘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sup>⑧</sup>欧阳修在《与陈员外书》中与陈员外论及公私书牋之体,说:“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sup>⑨</sup>

清代王兆芳《文章释》“劄子”条说:“劄子者,劄,刺箸也。刺箸所言以代坐论者也。宋臣下可面奏,而用劄子免疏失。”<sup>⑩</sup>何谓刺箸,赵翼《陔余丛考》卷30对古代名帖进行考证时,引《通鉴集览》说:“刺则用纸,阔二三寸,书姓名于纸之前,反卷如箸,以红绒要之,凡谒人必先托

① 吴曾祺《文体刍言》,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45页。

②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7-1228页。

③ 班固《汉书》,第1229页。

④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2页。

⑤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⑥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83页。

⑦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124页。

⑧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208页。

⑨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08页。

⑩ 王兆芳《文章释》,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01页。

门者通进,谓之投刺。曰反卷如簪,盖犹存削木遗式也。”<sup>①</sup>可见刺簪是名帖的一种,反卷如簪而称刺簪。从文体命名可以推测,劄子最开始应当有名帖之用,后来才用于奏事。

## 二、宋代殿对奏事制度与奏劄的产生、运用

宋代史书与众多历史笔记都认为用劄子奏事起源于太祖朝宰相范质,这件事在众多史料中均有提及。下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太祖乾德二年(964)正月丁亥条记载:

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武,每事辄具劄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寝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sup>②</sup>

这件事情发生在宋太祖年间,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为宰相,由于范质等人为前朝旧相,虽获太祖倚信,但心存惧惮,为了避免疏失,每次奏事,面奏的同时,把所奏之事同时写于劄子上进呈,退朝后将所得圣旨写于劄子上,同列宰臣签字确认。以劄子奏事,后遂为定式。从而取代了唐五代时宰相面见天子的赐茶坐论之礼,也取代了宰相入熟状奏事、皇帝画可降出奉行的形式。

上殿奏事用劄子辅助口奏,从而产生了劄子的第一种类型——上殿劄子,简称殿劄,这也是大部分文集当中奏劄的来源。《朝野类要》对“奏劄”进行解释时说,“又谓之殿劄,盖上面奏对所入文字也。凡知州以上见、辞,皆有此。”<sup>③</sup>总集《古文集成》卷27前丁集中即收录有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真德秀《召除礼侍上殿劄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51奏劄也收录有4道上殿劄子。宋人别集中的奏劄,除上殿劄子外,还有轮对劄子、转对劄子、面对劄子等多种称呼,以上殿、轮对劄子最为多见。

了解这些劄子,有必要先了解宋代皇帝坐殿视朝与臣僚上殿奏事的方式。据《宋史·礼志》记载,宋代皇帝日常政务处理的视朝分为:正衙常朝(又称正衙常参)、内殿常起居、百官大起居。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对宋代奉朝之制的记载非常简明:

本朝视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厘务朝臣,日赴,是谓“常朝”。垂拱殿曰内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谓“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厘务、不厘务并赴内朝,谓之“百官大起居”。是则奉朝之制自为三等。<sup>④</sup>

宋敏求卒于元丰二年(1079),其所述应当是元丰改制前的情形。《宋史·礼志》记载较为详细,涉及元丰改制前与后的情形:

常朝之仪。唐以宣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为便殿,谓之入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又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会不御。正衙则日见,群臣百

① 赵翼《陔余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3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页。  
③ 赵升《朝野类要》,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6页。  
④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页。

官皆在,谓之常参,其后此礼渐废。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宰相一人押班。其朝朔望亦于此殿。五日起居则于崇德殿<sup>①</sup>或长春殿,中书、门下为班首。长春即垂拱也。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望参官,遂为定制。<sup>②</sup>

综合上述材料可见,宋代视朝听政方式大致有:一、常朝,又称文德殿视朝,因文德殿又称正衙、前殿,故也称正衙常参、前殿视朝,文武官中在京不厘务官每日赴朝参见皇帝,在文德殿立班,而由宰相一人押班。二、常起居,又称垂拱殿起居,因垂拱殿又称内殿,故也称内殿视朝,皇帝每日御垂拱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每日赴朝议事。在元丰改制后,这些每日朝垂拱殿的官员称为常参官。三、大起居,又称百官内殿大起居,宋初在垂拱殿或崇德殿,元丰改制后在紫宸殿,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称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称为朔参官、望参官。<sup>③</sup>

上述朝参之制中,正衙常朝,皇帝只是接受百官朝拜,不坐,不具体议事,且正衙常朝在元丰四年(1081)废除。而垂拱殿常起居,即内殿视朝听政最为重要,在垂拱殿起居有早朝与晚朝之分,晚朝只是宰相、枢密、翰林学士当值者和近侍执事之臣参加<sup>④</sup>。而早朝最为日常,并且是大部分官员面见皇帝奏事的一种最为常见方式。早朝时,官员按照班次以次登殿,其奏事班次为:

早朝……宰相奏事,枢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对毕,枢密使复入奏事。次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群臣以次登殿。(大两省以上领务京师有公事,许即时请对。自余受使出入要切者,欲回奏事,则听先进取旨。)其见、谢、辞官,以次入于庭。凡见者先之,谢次之,辞又次之。<sup>⑤</sup>

从上述班次来看,早朝上殿奏事的人数与班次都非常多,班次依次有:宰相、枢密使、三司、开封府、审刑院、群臣,其后还有礼仪性的朝见、朝谢、辞别上任的官员。除前殿听政外,宋朝皇帝还有后殿视事,“宋朝皇帝前殿坐朝视事后,一般退至后殿,继续处理军国大事,听取内侍近职、诸路走马承受奏报情况,或者阅读馆阁所进呈的新修写的书籍、仓库衣粮、器物之式等,称为‘后殿再坐’。”<sup>⑥</sup>

据周佳研究,“官员在前、后殿奏事的时间均有限制,尤其是前殿早朝。北宋中期开始将前殿奏事班次限定在五班以内,且全部奏事时间不得超过辰时。”<sup>⑦</sup>辰时结束早朝,这使得官员奏事时间非常有限,一些事情往往只奏陈大概,其细节内容往往借助于文书来辅助,而劄子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挥其作用的。

① 崇德殿即紫宸殿,宋代朝会的六座主要宫殿名称因火灾等各种原因屡有变更。

② 脱脱等《宋史》,第2751页。

③ 宋代常朝制度不同时期均有一定变化,这里限于篇幅只叙述简明大概的方式,具体详情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三章第一节“皇帝坐殿视朝听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9-112页。

④ 脱脱等《宋史》,第2755页。

⑤ 脱脱等《宋史》,第2754页。

⑥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04页。

⑦ 周佳《北宋上殿札子探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周必大《文忠集》即有数道明确标为《垂拱殿对劄子》《后殿对劄子》《选德殿对劄子》的奏劄,表明这些劄子都是殿对奏事时所用。曾巩的《元丰类稿》也有多道劄子后面明确标注其进呈的时间与地点,如《请令长贰自举属官劄子》文后即标明“元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记录了神宗熙宁五年(1072)一次垂拱殿起居奏事的具体过程,从该过程的细节中可以看到劄子在奏事中的使用:

八月二十六日,垂拱殿起居,百官方退,两府犹侍立未奏事。(唐)垕忽扣殿陛请对,事不素请,殿中皆惊,上愕然,遣阁门使谕垕他日请对,垕不肯,又令诣后殿,垕曰:“臣所言者,请与大臣面辨。”又再三谕旨,垕伏不起,乃召升殿,垕至御座前,徐徐于袖中出一大轴,将进读,上曰:“疏留此,卿姑退。”垕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对陛下一一陈之。”乃展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前听劄子。”安石初犹迟迟不肯前,垕呵曰:“陛下前犹敢如此倨慢,在外可知。”安石悚然,为进数步。<sup>①</sup>

这件事情发生在熙宁五年(1072),唐垕在御前用劄子攻击王安石及其所领导的变法。文中透露官员上殿奏事的众多细节,从“徐徐于袖中出一大轴,将进读,上曰:‘疏留此,卿姑退’”可以看出,第一,上殿劄子又可称为奏疏,卷为轴状,是在御前展读的。第二,劄子奏事时,可以直接留于御前。

关于上殿劄子在御前展读,《丁晋公谈录》的记载亦可证,太祖时,“(赵普)泊因奏忤旨,上怒,就赵手掣奏劄子,授而掷之。赵徐徐拾之起,以手展开,近前复奏。”<sup>②</sup>赵普奏事时持有奏劄子,太祖怒,抽取他手上的奏劄子揉搓后掷于地上。他再奏时依然以手展开奏劄。上殿用劄子奏事时,劄子可以直接留于御前,直至元祐元年(1086)的诏令规定,劄子在御前进呈之后,还必须实封于通进司再投进一次,才能以正常程序将劄子所奏事件批降三省、枢密院等部门审核并执行。

宋人文集中的奏劄除上殿劄子之外,还有轮对劄子、转对劄子。

轮对、转对都是宋代官员轮流上殿奏对以便广开言路的奏事方式。宋代转对承继自唐代之次对与五代后唐之转对<sup>③</sup>。据《文献通考》记载,宋代从太祖建隆三年(962)开始,遇内殿每五天一次起居之日,在朝文班常参官与翰林学士等依次升殿转对,限为二人,指陈朝政得失、民生疾苦。次对、转对的称法、参与官员、时间等,历有沿革兴废,此不赘述<sup>④</sup>。轮对制度于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行,南渡后,皇帝为了广开言路,革除政治、经济弊政,规定百官每天轮流一人面对,陈时政之得失,举朝廷之急务。参与轮对的官员为侍从官以下官员,主要是庶官,数量较多,许多官员本来并没有机会面见皇帝,但因为可以参与轮对而获得面圣奏对的机会。

赵升《朝野类要》也记载,“自侍从以下,五日轮一员上殿,谓之轮当面对,则必入时政或利便劄子。”<sup>⑤</sup>官员上殿轮对,必须有劄子进呈。据宋人笔记《随隐漫录》记载,宋代官员上殿朝仪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80页。

② 潘汝士:《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页。

③ 据周佳的研究,次对与转对在北宋初期有所区分,次对为月朔入阁参拜时所用,而转对则为五日内殿大起居所用,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取消入阁仪式后,次对与转对两种奏对活动便逐渐合而为一。见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13页。

④ 参见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⑤ 赵升:《朝野类要》,第22页。

有持笏、劄子,“凡上殿轮对,初面西立……俟三省奏事退,引升殿立东南角,舍人前奏衔位姓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座左侧,身立,搢笏。当殿未出笏、叉手及横执劄子为失仪。”<sup>①</sup>这里提到“当殿未出笏、叉手及横执劄子为失仪”,则可见官员上殿轮对持有劄子,并且不能横执。官员上殿轮对或转对,持有劄子,一是可以将奏进之事预先写好,避免临场遗忘或疏失,二是可以使逻辑、文辞更为精准完备,以取得更好的沟通效果。

宋人别集收录有不少的转对劄子与轮对劄子。在宋人别集中收录有题为“转对劄子”的文集有:李弥逊《筠溪集》、胡寅《斐然集》、洪适《盘洲集》、杨万里《诚斋集》、陈傅良《止斋文集》、杜范《清献集》、许应龙《东涧集》、牟巘《陵阳集》、徐鹿卿《清正存稿》;而收录有题为“轮对劄子”的文集有李纲《梁溪集》、胡寅《斐然集》、史浩《鄮峰真隐漫录》、王十朋《梅溪集》、周必大《文忠集》、吕祖谦《东莱集》、虞俦《尊白堂集》、真德秀《西山文集》、程秘《洺水集》、卫泾《后乐集》、徐元杰《棣野集》、袁甫《蒙斋集》、文天祥《文山集》。从文集收录看,轮对劄子与转对劄子大部分为南宋文人所写,文集中最早见的如李弥逊、李纲、胡寅等人也为南北宋之交的文人。由此也可以看出,转对虽然在太祖建隆三年(962)开始实施,但时断时续,真正形成固定的制度,应该是南宋高宗年间开始实施轮对制度,所以文集中的轮对劄子多过转对劄子。

综上所述可知,宋代官员在上殿同皇帝当面奏事时,不论是日常朝参还是百官轮对,都持有劄子,劄子作为辅助面奏的文书,在奏事完毕之后进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代文书在行政中越来越重要,皇帝与臣僚的信息交流,在通过面奏完成的同时,还需要靠文书最终实现,以免疏失,劄子正是慢慢从口奏的辅助文书而独立成为与状、表一样的奏议文书,从而实现文体的独立。

上殿奏事用劄子,在太祖朝出现,在真宗朝慢慢形成定制,仁宗朝有所修订。这一完善的过程,从史书所载关于劄子使用的几道“诏令”中可以看出大概,这些关于劄子奏事制度的诏令集中出现于真宗朝,说明劄子奏事正在从个别、特殊现象慢慢走向定制。

最开始官员奏事所用的劄子用无名的,即未签署名字,在景德四年(1007)真宗对辅臣提出,庶官上殿不得用无名劄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戊子,上谓辅臣曰:‘比诏庶官上殿,不得以无名劄子奏事,盖虑邪说因缘交斗……’”<sup>②</sup>虽然这里提到不署名可能是因为匿名攻击,但劄子不署名、不著姓,这一点还可于后来仁宗年间的诏令得到印证,仁宗景祐二年(1035)“诏臣僚以劄子奏事者,惟中书、枢密院听如旧制,余悉著衔位、姓名。初,知制诰丁度进劄子,不著姓,禁中误付参知政事盛度,故条约之。”<sup>③</sup>从这里可以看出,旧制,中书、枢密院官员进奏劄子,可以不著姓名,故仁宗景祐二年诏令,除中书、枢密院听如旧制外,其他都必须都写上衔位和姓名,这一诏令的起因是知制诰丁度不著姓,禁中误将其劄子当作参知政事盛度的。从劄子不署名、不著姓等现象看,最开始,劄子的运用是较为随意的。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令要求“群臣上殿劄子,自今为二本进内。可行者一留中,一付有司;否者俱留不报”<sup>④</sup>。可见,之前的上殿劄子仅有一本,为臣僚奏事时进呈皇帝,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开始作为行政文书使用,可行者一本留御中,一本付有司进行覆奏、乃至降出执行。其他的奏事文书在太宗淳化元年(990)即已形成定制,必须下中书、枢密院、三司进行

① 陈世崇《随隐漫录》,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47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72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615页。

覆奏,然后颁行<sup>①</sup>。这里特别为上殿劄子提出须写二本,可见劄子的使用还在规范中。

从大中祥符六年(1013)开始,官员奏事必须具劄子进纳,不再单凭口述,其目的是避免官员假称面奏得旨。由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五月诏令可知:“诸州路走马承受使臣,多有踰越及受财贿,事发被劾,皆称面曾闻奏,因缘生奸。自今合奏公事,并须明具劄子进纳,不得辄凭口述。”<sup>②</sup>这一诏令意味着劄子从面奏的辅助已经正式成为文书行政的一种方式。

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三月七日又有诏令:“应臣(僚)上殿劄子奏事进呈后,不得批依奏;并批送中书、枢密院、三司等处,别取进止。”<sup>③</sup>从这条诏令可见,在此之前,上殿劄子在奏事进呈之后,官员会将进呈取旨的意见直接批于劄子之后,称“奉圣旨,依奏”。这种做法使得劄子奏事往往并不经过中书门下的覆奏而执行,这使某些政事处理得不到有司的监察审议。因而,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对此作出规定,劄子所奏事项必须送中书、枢密院、三司等处审议裁定是否可行。可见,至此奏劄的覆奏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规范。

从以上所引关于使用劄子奏事的诏令可以看出,劄子从最开始是面奏的辅助工具,在高级别大臣中较为随意地使用,到真宗年间开始变成独立的奏议文书,其相关格式、进呈方式、覆奏方式正一步步通过诏令进行规范而形成定制。这种规范在后续的使用中还在不断完善,在仁宗朝、神宗朝也不断有关于劄子的制度出现。

### 三、奏劄的文体特点

相比于奏状,劄子在写作体式上有更为简洁的特点。宋人文集中所留存的劄子大多没有将格式一道抄入,但司马光《书仪》卷一中“奏状式”后有劄子文体格式的介绍:

右臣下及内外官司陈叙上闻者并用此式。在京臣僚及近臣自外奏事兼用劄子,前不具官,事末云“取进止”。用榜子者,惟不用年、不全幅、不封,余同状式,皆先具检本司官画日,亲书,付曹司为案。<sup>④</sup>

下面将《书仪》中“奏状式”复印于下(见下页图1)。

奏状式之后的说明中,提到在京臣僚及近臣自外奏事兼用劄子,其特点是“前不具官,事末云‘取进止’”。也就是说,劄子比奏状更简单,前不需具官衔。在事件结束后,奏状的结束语为“伏候敕旨”,表明奏状的批复应该用“敕旨”,而劄子的结束语则是“取进止”,则劄子不需要用敕旨批复。

所谓“取进止”,叶梦得《石林燕语》解释道:“臣僚上殿劄子,未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佑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sup>⑤</sup>从这里解释

① “淳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诏:中外所上书疏及面奏事,制可者,并须下中书、枢密院、三司,以其事申覆,然后颁行,著为定制。”见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195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827页。

③ 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六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93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的记载是:“臣僚上殿劄子奏事进呈后,不得批送中书、枢密院、三司等处别取进止。”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正好相反,据周佳《北宋上殿札子探研》一文考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有误,以《宋会要辑稿》为是。见周佳《北宋上殿札子探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④ 司马光《书仪》,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第461页。

⑤ 叶梦得《石林燕语》,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3页。



看,取进止指奏事可行否之意,进即可,止即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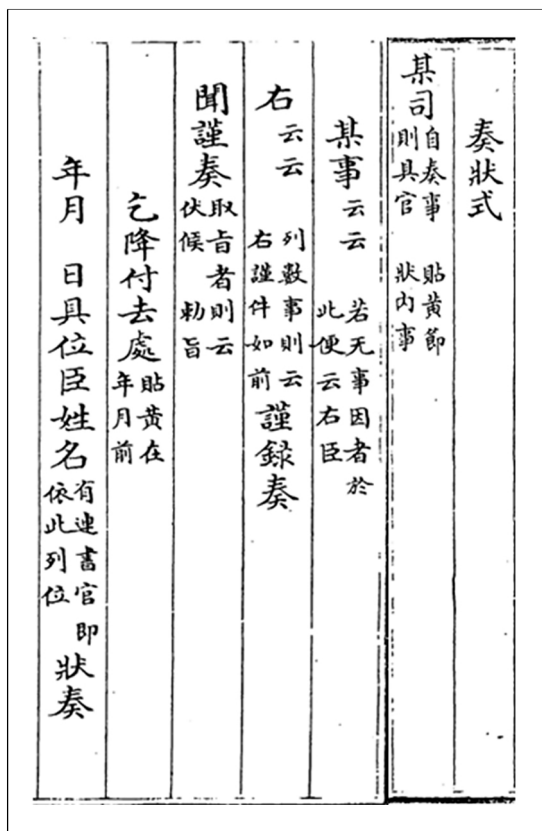


图1 《书仪》中“奏状式”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卷二“诸式门”中保留有奏劄的格式,现录于下:

#### 上殿奏对劄子首末式

奏为某事(劄子前用黄纸签贴节文、劄内事理谓之贴黄)

臣某云云取

进止

年月日 具位姓 某劄子<sup>①</sup>

以上格式,可与文人集中作品参证,以程颐《论经筵第一劄子》为例:

#### 论经筵第一劄子

臣伏观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辅养。昔者周公辅(一作傅)成王,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熏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

窃闻间日一开经筵,讲读数行,群官列侍,俨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责辅养之功,不亦难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爱,亦未敢便乞频出。但时见讲官,久则自然接熟。大抵与近习处久熟则生褻慢,与贤士大夫处久熟则生爱敬。此所以养成圣德,为宗社生灵之福。天下之事,无急于此。取进止。

贴黄:

臣窃料众人之意,必以为皇帝尚幼,未烦如此,此乃浅近之见。夫幼而习之,为功则易;发然后禁,礼经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盖为此也。<sup>②</sup>

程颐于元祐元年(1086)被任命崇政殿说书,在上任之前,他上《论经筵劄子》三篇,阐述其所理解之经筵官性质、职责与设想。第一劄子论述了守成之君的辅养之道。从上劄子可看到,劄子文末的结束语是“取进止”,而劄子后有贴黄。所谓贴黄,叶梦得《石林燕语》解释曰: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劄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理,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sup>③</sup>

① 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393页。

② 程颐、程颢《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37-538页。

③ 叶梦得《石林燕语》,第42页。

叶梦得的解释较为清楚,唐代敕旨如有小更改,用黄纸贴之,称为贴黄。宋代的贴黄,则是指列举文中所未尽或重要之旨,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如前引程颐劄子的贴黄就是一例。上引《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奏劄首末式”指出,“前用黄纸签贴节文”,所谓节文,指劄子的内容概要,也即叶梦得所说“略举事目与日月、道理等”,节文贴于劄子之前或封皮上的,也叫引黄。程颐在《论经筵劄子》第一篇的贴黄中反驳了他人的观点,强调了对年幼的皇帝进行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篇的贴黄中提出经筵讲官应当坐讲以示“尊儒重道之心”,皆为重要观点的阐述。概括来说,贴黄的作用主要有补充劄子所论重要事实,概括劄子的内容,揭示点明劄子所论主旨等。宋人不但劄子使用贴黄,奏状、表、书也使用贴黄,但以劄子为多见,宋人总集、别集中保留有大量带有贴黄的劄子。

前文提到官员奏事取得皇帝同意,在劄子后面批上“奉圣旨依”或“奉圣旨依奏”即降下。这种批注于《古文集成》、周必大《文忠集》等集中依旧可以见到痕迹。如《古文集成前集》卷26前丁集五所收录刘后溪《论程氏道学劄子》其劄子结尾有:

……伏乞圣慈留神采览,必能上当于天心,然后下臣此章,风晓在位,一洗往陋,共趋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诛责。取进止。二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依。<sup>①</sup>

结束语“取进止”之后的“二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依”应当为进呈取旨之后,再批注于劄子上的,这种批注在文集中不单见于劄子,许多宋代的奏状后也批有“奉圣旨依”或“奉圣旨,依奏”。大部分文集收录奏劄的结束语为“取进止”,后面并无时间和批注。这种批注应当是文集收录作品对实物劄子进行抄录时对相关格式内容的保留,一般用小字写在文后。这种痕迹在周必大《文忠集》中较为多见。如卷139奏议六收录“兵部侍郎选德殿对劄子二首”其一《论用人二弊》结尾即用小字批注“奉圣旨,依奏”<sup>②</sup>。卷131收录《辞免除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劄子》之《三辞免劄子》后用小字标有“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已降诏不允,不得更有陈请”<sup>③</sup>。这里保留的批注文字,除了“奉圣旨依”外,还有对辞免行为的其他处理结果“已降诏不允,不得更有陈请”。

以上所论为奏劄的体式特点,从文体风格来说,由于奏劄是用于上奏皇帝,并且常在轮对、转对、上殿等场合在御前展读,故而奏劄的写作比较讲究叙事、义理、文辞、文气,重视说服力、感染力。一般而言,宋代的奏疏有文繁意肆的特点,四库馆臣曾评“宋人奏议,多浮文妨要,动至万言,往往晦蚀其本意。”<sup>④</sup>奏劄的篇幅长短不等,但基本上都比较简洁切当,有的只有几十字,简明扼要交待事情,长篇大论者也重视文章的简肃条畅。

以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为例,该劄子是王安石于熙宁元年(1068)应神宗问“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而作。王安石在劄子中分析了宋朝自太祖、太宗、仁宗以来百年无事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吏治、科举、监察、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病,对神宗皇帝提出了“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的警示与劝勉。

这篇劄子所论眼光独到,文简理周,结构缜密,委婉措辞中提出严重问题,写作布局上也用心良苦。其文辞简洁处,如对四帝的称颂:“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

① 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59册,第200页。

② 周必大《文忠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48册,第534页。

③ 周必大《文忠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48册,第468页。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9页。

宗,无有逸德。”四朝事迹以四个词语概括,简洁精劲;其思理周密、用心良苦处,如分析当时社会弊病之前,先颂扬仁宗皇帝,在颂扬之中暗寓其问题,借题发挥,既能陈述问题,又避免了进谏的风险。故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论道:“此篇极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全在说仁庙处,可谓抟虎屠龙手。”<sup>①</sup>其文气之流畅,有战国策士之风,如:

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

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sup>②</sup>

奏劄所议话题往往关系重要的政治决策、重大历史事件。如前引王安石《论百年无事劄子》,历代文章总集都将其作为奏议文的代表作,如吕祖谦《宋文鉴》、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真德秀《续文章正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吴讷《文章辨体》、姚鼐《古文辞类纂》等总集都将其选入,这些总集都对这篇奏劄的议题、写作方法、效果与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肯定,真德秀还将其选入“论事”类之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篇奏劄,立意深远,说理透辟,文气流畅,具有奏章不枝不蔓、文简理周的特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篇文章涉及北宋的熙宁变法,是宋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从一篇劄子可窥一段历史的走向,因而有着鲜活的历史场景。据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记载,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向他询问“方今治,当何先?”“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等问题。王安石在召对之时以“以择术为始”回答之后,再上劄子详细阐述了召对所论问题。王安石矫世变俗之志,宋神宗富国强兵之愿都可由这篇文字及其背后的历史所揭示。

吕祖谦编《宋文鉴》,将程颐的《论经筵劄子》三篇悉数选入,而王霆震在《古文集成》的编选中,则不但选入了程颐的三篇《论经筵劄子》,更是围绕这一事件将相关的劄子也一道编入。在程颐的劄子之后编入了范祖禹《乞复召伊川还经筵劄子》、胡安国的《乞封爵邵张二程列从祀劄》、程颐的《上殿论君道劄子》《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刘后溪《论程氏道学劄子》等。文章选择中呈现出浓厚的理学思想。因这一系列劄子,宋代士人对经筵讲席的认识与看法,对“君道”“师道”的思考,得以细致显现;程颐担任经筵讲官前后的历史事件也得到突显。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哲宗即位,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下,程颐应诏入京,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担任经筵讲官。此前程颐辞免了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等职务。在担任经筵讲官之前,他显然对此职务有所顾虑又有所期待,在《乞再上殿论经筵事劄子》中用两道贴黄表示了这种顾虑,其贴黄一表示自己之所以不候命下先有奏陈,是希望“朝廷审处于未授之前,免烦回改成命”。其就职之前所上《论经筵劄子》三篇则显示了他对经筵讲官的期待与要求:即以道学辅养人主,致君行道;树立师道之尊严与经筵官之权威。很显然这是宋代儒者对“圣王之道”的推崇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角色意识的体现。

大量宋人奏劄因其议题的重要性、写作风格可借鉴性而成为经典奏议文,为奏劄这一新文体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典作品,如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劄子》、苏轼《乞

①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4册,第18页。

② 吕祖谦《宋文鉴》,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75页。

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胡寅《论遣使劄子》、范祖禹《论农事劄子》等一系列劄子都被历代总集收录,作为经典作品流传。茅坤在其《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总集中即选入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人 80 余篇劄子,一一点评其特点与成就,也可见宋代奏劄的重要文体价值与精神内蕴。

此外,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的编纂,以及宋代大量单行奏议集的涌现,奏劄无不成为重要之一体。在目录学分类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立“章奏”为一门,列于集部之末,载录宋人奏议集 36 家。在集部单列“章奏”一门,正是宋代奏议文集繁荣与奏议文价值被重视的一种表现。可以这样说,宋代士人有一种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想,他们的政治思想往往集中于奏议文字之中,如范仲淹所论“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sup>①</sup>,奏劄即是宋代士人政治思想的一种载体,也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种重要工具。

#### 四、宋人对奏劄的选择

唐人奏事多使用表、状,这一文书在宋代相因袭,宋人奏事文书有表、状、劄子之用,而从宋代别集来看,劄子使用渐渐增多,劄子在奏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并有超过状的趋势,究其原因与劄子的文体特点、上奏途径的便捷有关系。

宋初用劄子奏事,其使用级别是有限制的。北宋年间,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劄子。”<sup>②</sup>所谓两制指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与起草外制的中书舍人。“非时有所奏陈”,则揭示劄子在起初并不是如表、状一样的常规奏事文书。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明道二年(1033)六月辛酉条记载:“故事,在外惟两府,在京惟大两省,方许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状云。”<sup>③</sup>两省指中书省与门下省,两省官里的门下省五品以上官:给事中、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中书省五品以上官: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为大两省官。两府,这里应指即尚书省与枢密院。只有上述这些级别的官员可以用劄子奏事,其他官员奏事需要上表、状。可见,劄子作为奏议文书与表、状的功能是一致的,但使用的官员级别不同。这也说明劄子是要近职官更为便利的奏事方式。

在宋代,屡有官员因越级用劄子奏事而受到处分,如仁宗明道二年(1033),“降前咸平太康县驻泊巡检、右侍禁张孚为庐山县兵马监押,坐用劄子奏事也。”<sup>④</sup>张孚作为太康县驻泊巡检、右侍禁,不够级别使用劄子,因为用劄子奏事而被降为庐山县兵马监押。朱熹曾经写有《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状》,因其知南康军时,为南康军陈乞蠲减税钱事,用劄子闻奏,遭到台谏官弹劾。朱熹状文中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哪些情况可以使用劄子奏事:

臣窃见旧制,章奏凡内外官登对者,许用劄子,其余则前宰执、两省官以上许用劄子,以下并用奏状。乞申严有司,应帅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机,许用劄子。<sup>⑤</sup>

可以用劄子奏事的情况分为三种:一为内外官登对,即内外臣僚上殿奏事,包括前文提到的常

①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王蓉贵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② 欧阳修《归田录》,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62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621页。

⑤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87-988页。

起居、轮对、转对等情况;二为宰执、两省官以上;三为涉及军事机密的帅曹、郡守主兵官。

官员屡有违反规定,越级用劄子奏事,主要是因为劄子进奏途径更为便捷,也更容易为皇帝所阅读。前文已提到,劄子本为面奏时辅助文书,可以直接在御前进呈,而状的进呈则需严格按照通进渠道进呈。在外官员的奏状,应邮递付进奏院,进奏院得到奏状后,每日具程都目,纳银台司<sup>①</sup>,而银台司“掌受天下奏状案牒,抄录其目进御,发付勾检,纠其违失而督其淹绶”<sup>②</sup>。在京官员的奏状由阁门司递入<sup>③</sup>,由阁门与银台司收集而来的章奏,最后由通进司进御,“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牒,及阁门在京百司奏牒、文武近臣表疏,以进御,然后颁布于外。”<sup>④</sup>在京、在外官员的奏状都需要经过通进司通进,而这样,文书的传递效率必然受到影响,“通进银台司所承受到进奏院所投进文书种类,以各地奏状为最多……面对如此大量的文书,银台司从承受、点检后到投进、发放,惯例是在六日内完成。”<sup>⑤</sup>

从通进上看,直达御前无疑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劄子则有这一优势,这也是宋代官员使用劄子日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前文已经提到,官员在面奏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御前进呈劄子,劄子不但可以在御前进呈,而且前期可能有官员直接向皇帝请求将劄子批降三省、枢密院,如范祖禹《乞再贬蔡确劄子》其后即有小字批“乞降付三省”,因而元祐元年(1086)有诏令,明确规定:“臣僚上殿劄子,于帘前进呈讫,并实封于通进司投进,即不得直乞批降三省、枢密院。”<sup>⑥</sup>要求劄子在帘前进呈之后,还需要实封经通进司投进。

综上所述可见,文体体式的简洁、批复方式的简单、通进渠道的便捷,能直达御前,使用官员级别高,因而更受皇帝重视,这些都是宋代官员越来越多选择劄子而不是奏状奏事的原因。于是劄子的写作日渐增多,到南宋期间,劄子使用者的身份已经不再局限于近臣高官。这说明在劄子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身份不断下移。这与唐代奏议文书“状”的使用与兴盛颇为相似。状的兴盛与唐代使职的出现密切相关,使职最初作为“特奉制敕”的近臣,以“状”向皇帝汇报工作,在当时普遍使用的“奏抄”申奏程式之外,另开一条直接向皇帝奏报的渠道,随着使职所掌政务范围的扩大,状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扩大,终于转变为常规的奏议文书。在状成为常规奏议文书之后的宋代,劄子被选择成为大两省、两府高官使用的奏事文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劄子的使用群体也逐渐下移,到南宋绍兴年间,终于形成兼具奏议、公移、书信三种文体类型的文体。从奏议文体发展演变来看,可以说,正是制度变革中书写者对文体的选择造成文体发展演变的结果。

(责任编辑 张亚权 禹玲)

① 王化雨《宋代皇帝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见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

② 脱脱等《宋史》,第3782页。

③ 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阁门司》,收录于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④ 脱脱等《宋史》,第3782页。

⑤ 李全德《文书运行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收录于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第318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755页。

compromise with Japan any more. The Lugouqiao Incident did not follow the old path any more with Japan pressing on and China yielding back. Instead, following with Chinese Army fighting back, there came Chiang Kai-shek's Lushan speech making clear such a serious stand that it was the moment for sacrifice, and finally, the resistance war broke out in Shanghai, and the KMT Government declared that China would wage a war of self-defense and fight against violence. It reflected changes in politics, society and people's attitudes in China. The decision for resisting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by the KMT and its Government complied with the situation generally.

### **Yan Xishan Dangerously Gambling with the KMT, CCP and Japan for Survival (1935–1945)**

WANG Qi-sheng

In the time of 1935–1945, Yan Xishan sought survival among three powers—the KMT, the CCP and Japan. He looked for any space for his survival by playing tactics, which meant he gambled frequently among Mao Zedong, Chiang Kai-shek and Japan. Actions by any of these parties frequently triggered reactions by the others, attempting to maximize their interests in the changed situation and chances given by the situation. Yan Xishan had closer relation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kind with the CCP than with the other local power factions. To the CCP, Shanxi was of utmost strategic importance—an important hub in the CCP's expansion from northwestern China to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Confronted with two formidable rivals—the Japanese and the KMT, the CCP undoubtedly regarded Yan Xishan as a middle force capable of acting as an important buffer. The CCP could neither afford to destroy Yan Xishan completely, nor force him into an alliance with the KMT or the Japanese. Mao Zedong understoo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forces, and was the best at winning over these for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CCP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an be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is strategy.

### **The KMT Politicized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 of Anti-Japanese Invasion**

JIN Yi-lin

Shortly after its reshuffle in 1924, the KMT began to put the “politicized education” into practice. Especially during the War of Anti-Japanese Invasion,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war-time policies, so that human,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might be better utilized to fight against the enemie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in the war time, the KMT, as the ruling party, took the same position: with very limited funding for education, the KMT government had to exercise a very tight control on educ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cause education be not interrupted and serve a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However, the KMT's politicized education did not provide r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youth, and its sole purpose was to indoctrinate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cultivate obedience to the KMT regime. In the end, this failed policy of the KMT only had the effect of alienat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finally chose to take side with the CCP and became the “second front line against the KMT.”

### **On the Writing of Memorials to Throne and the Memorial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WU Zhi-wei

Appear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becoming widely used since then, *zhazi*, a new literary style, has three literary genres: the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As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zhazi* was originally an auxiliary means for reporting to the throne face to face. Fanzhi and other prime ministers used it to avoid lapses when they gave a statement to the throne face to face in the Rein of Taizu in the Song Dynasty. It became an independent document in the Rein of Zhenzong. *zhazi*'s layout, type of presentation, and pattern of approval gradually became more standardized through the imperial edict. *zhazi* was initially used by the high-ranked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Shangshusheng*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Shumiyuan* (Top Military), *Zhongshusheng* (Central Secretariat) and *Menxiasheng* (Ministry of Supervision). Thereafter,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zhazi*, say, being convenient, concise in writing, easier to get the official reply, used by hig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zhazi* became common among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Moreover, since *zhazi* was read to the throne,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its diction, nar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Due to the advantages above, a large number of *zhazi* were collected in the anthologies of the classics so that people of later generations may have chances to appreciate them.

###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Rhetoric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East":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Education Promoted by the Successo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U Chun-xian

Yao Nai's *Anthology of Classical Prose* (《古文辞类纂》), with both its selections and comments, is quite important in the literary study of classical writings of the time when the location of education was moving from *shuyuan* (书院) to new style schools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re-compi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comments by the successo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Yao Nai's anthology was gradually becoming a shared academic resource. Taking it as their mission to pass on the wealth of classical writings, the Tongcheng successors, who stick to the Tongcheng tradition of anthologies and comments, merged that tradition into classroom materials for teaching of classical prose in new type schools. These new materials now include literary style classification, evolution of literary genres, article writing and appreciation, etc. Compared with the literary history which emphasizes on historical narration, these teaching materials celebrat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iterary genres, the method of tedious genre discrimin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developed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been discarded, with a return to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hat focuses on literary appraisal and *yifa* (义法). It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stylistic theories embodied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文心雕龙》).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mode of education, the successo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insist that there be no differentiation of sects but only that of approaches, therefore the classical prose education that they advocated was able to go beyond a sense of sectarianism, and induce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the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writing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本刊启事

本刊全文资料已加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并提供读者服务,如作者有异议,请来函说明,本刊可作适当处理。